

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

◎ 高華

* 作者應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邀請，於1999年10月至12月做了為期兩個月的訪問研究，利用該中心搜集的資料進行有關研究，特此說明並致謝意。

近20年來，圍繞60年代初大饑荒與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關係已出版了若干論著，但學術界卻較少論及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關係。本文認為，四清運動是毛澤東針對大饑荒而引發的黨內外一系列矛盾所作出的重大反應。四清運動雖然初興於1963年，但是早在大饑荒趨於頂點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繼出台，毛澤東認定造成大饑荒的主要原因是階級敵人的破壞和民主革命不徹底，並著手部署反擊「資本主義復辟」。只是由於1961年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已陷於極度困難，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事實上將毛澤東有關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懸置起來，才未使之演變為大規模的政治運動。1962年下半年，經濟復蘇已成定局，毛澤東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並迫使中央核心層接受了他的意見。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3年春夏之後，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

一 毛澤東對大饑荒的反應

進入1960年，由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引發的國內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面已經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現糧食緊張、人員外流、浮腫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數激增等現象。但是對於中央領導層而言，這些並不是1960年產生的新情況，從1958年始若干省份就已出現類似情況，並曾向北京匯報¹。毛澤東也曾就解決此類問題作過批示²，現在毛澤東再次要求全國各級黨委注意解決此類問題，並研究解決的辦法。

1960年3月，毛澤東針對糧食緊張的問題作出批示，要求全國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桿、根、葉大製澱粉」³。毛澤東對「非正常死亡」現象也作出了反應。毛批示：「這些問題，各省、市、區都有，如不注意處理，定會脫離群眾。」毛指出，用召開六級幹部會議的方法處理此類問題較好⁴。同月，北京對甘肅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斷——自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隴西、和政三縣出現大量餓死人現象，中央批轉甘肅省委解決通渭問題的意見稱：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機會主義份子與反革命份子搞在一起，「從縣到基層都混進一批反、壞份子，幹部隊伍不純是發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⁵。在此前後，中央還向全國通報了寧夏自治區黨委處理中寧事件的意見，認為1959年冬到1960年春發生的中寧縣「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寧民主革命不徹底，建黨根子不正，黨組織嚴重不純」⁶。

面對糧食緊張和「非正常死亡」激增等現象，毛澤東的看法是「現在形勢大好，缺點錯誤是部分的」⁷。他要求解決某些缺點和錯誤，然而毛提出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召開六級幹部會議一類——並不能真正舒緩農村的緊張情況，因為這些會議的主題是貫徹中央反右傾、鼓幹勁的精神，諸如堅持社會主義陣地公共食堂等，在「繼續躍進」的形勢下根本無從解決餓死人的問題。

但是在毛澤東看來，所有這類消極現象都是前進中的暫時困難，不應妨礙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在毛的全力推動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會議更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

在全國經濟急劇惡化的形勢下，毛澤東的樂觀態度助長了省一級領導的新一輪浮誇風。1960年3月，由張平化任第一書記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報告：該省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⁸。在由舒同任第一書記的山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雖然也承認該省存在水腫、餓死人現象，但卻把壞事當作好事匯報，這就是，即便有缺點，也是在正確路線上，報告認為全省「當前形勢無限好」⁹。由吳芝圃任第一書記的河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則強調該省如何「深入學習毛著，系統總結大躍進豐富經驗」¹⁰。吳芝圃向毛報喜訊：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辦得好的食堂佔總數66%。毛對河南報告大為讚賞，稱其「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和科學性的文件」¹¹。1960年上半年，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由周林任第一書記的貴州省委卻向毛匯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佔總數80%。毛又予以讚揚，說貴州的經驗「是一個科學的總結」¹²。

幾個大躍進紅旗省大辦食堂的先進經驗使毛澤東大為振奮，他甚至將黑龍江省的經驗寫成通俗易記的四言詩¹³。毛表揚豫、湘、川、雲、貴、滬、皖等省市做得最好，要求全國學貴州、學河南，「一律照此辦理」¹⁴。

各地的這類浮誇報告是否對毛澤東構成「誤導」？筆者認為即使有些影響，也不大，因為毛可以通過各種信息渠道了解全部情況。1960年2月，在供省級以上領導幹部參閱的情況簡訊中又恢復了有關農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腫蔓延」等情況的內部通報（1959年廬山會議後一度停止了類似情況的內部通報）。重要的是，毛需要吳芝圃一類的報告和經驗總結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但在4月以後，毛澤東對狂熱的宣傳

已略有不安。4月28日，他在一份批示中提到：在宣傳報導方面要「防止發生不切實際的浮誇風」¹⁵。毛的這個批示只是提到宣傳降溫的問題，並不涉及已大量出現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6月，毛澤東似乎開始覺察到，或者是真正願意面對農村的嚴重問題，起因是陶鑄的一份報告。陶鑄提出，解決農村問題的方法是開展一場「三反運動」，即反官僚主義、鋪張浪費和形式主義。具體內容為糾正基層幹部的違法亂紀、強迫命令一類錯誤。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經驗將打擊矛頭針對社隊基層幹部，其主題與方法和幾年後的四清極為相似：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帳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分不好」的幹部；打擊範圍掌握在3%之內；通過運動，最後促使幹部參加勞動¹⁶。

陶鑄的報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又開出了解決問題的藥方，果然獲毛澤東賞識，他稱讚廣東「提出來的問題和對這些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¹⁷。

1960年6月後，毛澤東對大饑荒的解釋逐步清晰，他認為問題主要是由「五風」造成。毛的上述判斷應該不錯，卻只涉及問題的現象層面，他所提出的解決問題之道仍是其一貫堅持的大搞階級鬥爭的一套。

毛澤東要求在農村立即開展整風、整社，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搞三反運動，同時繼續堅持農村食堂，其結果是「三反」於事無補，1960年9月的「八字方針」也不能立即緩解大饑荒，形勢反而進一步惡化，致使部分地區餓死人的現象在1960年下半年後發展到「慘絕人寰」的地步。1960年6月後，河南信陽地區餓死人已達100萬¹⁸。

面臨極端惡化的形勢，毛澤東終於同意加大調整政策的力度，1960年11月3日，中央下發緊急指示信（12條），提出全面反五風，允許農民保留小額自留地，經營小規模家庭副業。在當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上，毛雖提到「只有大集體，沒有小自由不行」，卻沒有將其變為中央的政策，現在終於明確為具體政策。但是「緊急指示信」仍然堅持農村食堂，此項規定在相當程度上沖淡了有關自留地的精神。

1960年11月，毛澤東開始修正「形勢一片大好」的論斷，改口說「三分之一的地區的形勢不好」，同時他又明確提出，調整政策後，幾個月形勢就會好轉¹⁹。毛要先將基調定下來，即解釋為何全國部分地區形勢不好。

現在毛澤東的解釋比6月份前進了一步。他說，這是因為這些地區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²⁰。可是有無領導方面的責任和缺失呢？毛爭取主動，首先承認自己有錯誤。1960年6月，毛在〈十年總結〉一文中第一次談自己的「錯誤」，毛說，他的「錯誤」在於將過渡時期估計太快，但馬上強調：「錯誤不可能不犯」，「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免的」。毛並沒有忘記將其他人捎上，他說「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²¹。1960年11月，毛在一份為中央代擬的文件裏，用第三人稱的方式再次談自己的錯誤，言辭和態度都非常懇切²²。

毛澤東已作「自我批評」，各省大員紛紛表態願承擔責任、為毛分憂。僅僅半年之前，在北戴河會議期間，各省的書記們還不肯檢討，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極為焦急，他耐心啟發華東各省的書記率先作出檢討，但是書記們就是不上鉤²³。柯慶施無奈，只能借上海工人之口說：「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對的，一個指頭的毛病是出在我們手上。」²⁴

毛澤東既已下「罪己詔」，各省檢討報告如雪片般報向中南海，所有的檢討都是一個調門：中央的政策是正確的，地方在執行正確的政策過程中出了偏差。毛心領神會，對這類報告一概嘉許²⁵。

1960年11月後，毛澤東焦急地等待各地報來「好消息」，地方領導非常理解他的這種焦灼心情，迅速報來的各種材料，皆是「12條」下達後農村一片新氣象的內容。安徽省委的報告稱，傳達「12條」緊急指示信後，全省「人人興高采烈，生產出現了一片嶄新氣象」²⁶。黑龍江省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開展「紅思想運動」，居然偽託工人之口說，「現在每月能吃大米白麵，有這麼多的糧食，真是上天堂了。今後我再也不吵糧食不夠吃了」²⁷。

此時此刻，毛澤東太需要這類報告，毛更對「亂講」十分警惕，他贊同林彪的意見，禁止軍隊同志向地方領導反映對形勢問題的看法²⁸。

1960年11月，毛澤東的心情較為低落，11月29日，毛網開一面，批示免去資本家下放農村，改為下放城市企業²⁹。如果沿著這條路繼續下去，加大「罪己詔」的分量，可能會加速扭轉危急局面，毛也不失為知錯即改的「賢君」。但毛澤東鬥爭了一輩子，經歷了無數風浪，他忽然對自己的領袖威望變得異常敏感起來。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發軍隊的一份文件中親筆寫道：「特別是領導幹部，一定要好好讀書，好好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³⁰。毛也將外國左派歌頌他的資料批轉給中央和省級負責幹部閱讀³¹。毛心細如髮，完全清楚黨內外早已怨氣衝天，如果聽之任之，極有可能會危及自己的領袖地位。他只能採取進攻的姿態，大講階級鬥爭。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對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斷，毛指出：全國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復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紮根串聯的辦法，組織階級隊伍（貧協），開展對敵鬥爭³²。階級鬥爭的對象有兩類：鑽進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和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

然而問題還有另一面，儘管在毛澤東巨大的意志壁壘前，中央層已無一人敢於站出來講話，但毛深知不滿的潛流正逐漸匯集，畢竟大量死人事是客觀存在，毛知道現在已到了鬆動閥門的時候了。

1961年1月，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上提出，1961年搞個實事求是年，他要求全黨各級負責幹部下鄉搞調查研究，毛且同意把給農民的自留地由原先佔公社土地的5%上升為7%，同時開放農村的自由市場。

毛澤東在1961年初的判斷和接連出台的措施——既要搞階級鬥爭，又對農民作出若干讓步，在實施中帶來極複雜的後果：在一段時期內，死人現象繼續蔓延，即使大抓階級鬥爭和幹部下鄉救災也無法予以制止，以致出現建國後最嚴重的危機。

八屆九中全會後，各地開始貫徹毛澤東有關反擊資本主義復辟，在農村整風、整社、整黨的指示。1961年1月，保定市委書記下鄉，搞紮根串聯，組織貧下中農協會，調查的結果是：基層政權全為壞人當權，貧僱農出身的幹部全被地富收買，其根本原因在於土改不徹底。天津的經驗是：應對犯錯誤的幹部進行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河北省的經驗則認為，出現特大困難的原因之一乃是過去對地富反壞「摘帽」多了³³。問題在於，即使全國各地普遍開展了「民主革命補課」，也無法遏止大量農民餓死的現象，殘酷的現實是：貧下中農和地富一起因絕糧而死。

1961年，全國的危急形勢已趨頂點，據不完全資料反映：1961年6月之前，福建省龍岩地區病人已達13.5萬。流入陝西的甘肅婦女，與陝西男子「非法同居」者達三萬人以上。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鮮的中國東北地區的公民已達4,500餘人。1961年夏情況進一步惡化，在大躍進重災區山東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專區，6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700多人，9月份即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僅聊城一地外流討飯人數即高達10萬，賣兒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個別基層組織已完全癱瘓³⁴。

就在形勢不斷惡化的同時，一股微微的暖流已開始在中國農村大地升騰。隨著中央加速調整政策，特別是解散公社食堂、恢復農民自留地和開放集市貿易後，農村果真出現了轉機，瀕臨死亡的農民又有了一口活氣。不少地區的基層幹部更向前邁進一步，在自發解散公共食堂後（許多省區的農村食堂因斷糧絕糧，在中央下達指示前即自行解體），甚至搞起了「大包乾」。1961年10月，貴州這個一年前大辦食堂的紅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縣實行了包產到戶。短短數月，原先死氣沉沉的農村，又有了活力。

毛澤東最先捕捉到這股經濟復蘇的跡象，現在他的精神又振奮起來。1961年9月，毛在廬山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困難已到谷底，形勢一天天向上升³⁵。

二 懸置階級鬥爭：劉、周、鄧、陳的態度

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上提出搞社教的指示，要求以階級鬥爭的精神，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劉少奇等不正面反對毛的意見，也在各地部署貫徹毛的指示，但總的說來，是將毛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懸置起來而把救災、調整經濟放在首要的地位。

劉少奇原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積極支持者。在廬山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上，劉少奇全力支持毛，雖有資料反映，劉對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有所保留³⁶，但從廬山會議後至1960年上半年，劉在公開和私下場合都和毛澤東保持一致。進入1960年下半年，劉少奇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他在繼續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原先與毛完全一致的調門，漸漸也夾雜了某種「雜音」。

劉少奇在60年代初已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國家已陷入嚴重危機，他也了解問題癥結所在，更知道自己作為中央第二號人物對此應負的責任。因此劉在1960年極為謹慎，說話、辦事都小心翼翼，盡量照顧、遷就毛澤東。

1960年6月，劉主持各大區、各省市負責人會議，指出半年以來問題嚴重，卻將「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情況的問題」放在一起講³⁷，以減緩講話的衝擊力。1960年9月，中央雖然通過「八字方針」，但在落實、貫徹方面卻顯得遲緩、無力³⁸，以致數月後仍看不出成效。劉少奇在談到「非正常死亡」時更是十分小心，他說「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裏面的人也餓飯」³⁹，盡量使語言不那麼尖銳。

雖然劉少奇已為毛做了不少開脫的工作，但他作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卻不得不每天面對各地如雪片般報來的災情報告，在這種嚴峻的形勢前，劉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月10日，劉少奇首次針對毛著名的「指頭論」發表了看法，他說「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⁴⁰。1961年3月，劉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一方面講「有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檢討起中央決策的失誤。劉說「中央有些政策，決定前缺乏很好的調查研究，根據不夠，決定以後，又沒有檢查執行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⁴¹。劉少奇這番話，帶有自我批評的含義，卻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為多年來，「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稱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劉，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們以中央的名義起草的各種文電，也須報毛批准後才可下發。因此，劉的這番言論，已構成對毛的「壓迫」。

形勢日趨困難，對劉的態度變化有決定性的影響。1961年4月，劉親赴家鄉蹲點，對形勢的嚴重性有了完全徹底的了解。八屆九中全會後，毛又去了南方，由劉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劉少奇加大了政策調整的力度：1、同意陳雲建議，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以舒緩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2、支持陳雲有關減少2,000萬城鎮人口的建議。3、主持罷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現象嚴重省份的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1961

年，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職，調作較次要的工作。劉甚至提出應逮捕法辦一些罪行嚴重的地、縣負責幹部。

劉少奇的上述舉措十分有力，進口糧食和罷免浮誇官員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已被嚴重損害的共產黨的威信。劉在與毛共事的幾十年中，既有順從、畏懼毛的一面，也有提出並堅持自己看法的一面，這是劉少奇政治性格的特點。1959年4月，劉接任毛做了國家主席，1960年下半年後，毛有所消沉，暫時做了「甩手掌櫃」，默許劉少奇等對過往政策進行適當調整，又使劉的活動空間得到擴大。

劉少奇態度的變化對核心層其他領導人具有極重要的示範作用，周恩來受到很大的鼓舞。周作為國家經濟的總管，完全了解實情，1960年後更是為調糧、救災日夜辛勞，11月，周又擔任了中央瓜菜代領導小組負責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複雜性和微妙性。在那幾年，周十分注意與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周說：人民公社有缺點是難免的，是不到一個指頭的問題，而且毛主席已經糾正了⁴²。1960年，安徽餓死人已經成了半公開的秘密，3月29日，周將反映安徽死人的群眾來信批轉給曾希聖：「也許確有其事，也許誇大其辭」——面對毛的這位愛將，周盡量把話說得四平八穩，但周批語的主調仍是希望曾希聖加強注意，派人前往調查，並要求曾將調查結果報告周⁴³。

在這之後，毛澤東有關對農村情況的判斷已經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徑。1960年12月6日，周代中央草擬文電，針對山東、河南、甘肅、貴州等幾個餓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現的嚴重情況，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的報復」，周強調，「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最激烈表現」⁴⁴。由於周對毛的認識太深，從內心深懼毛，因而他一般不會主動向毛提出任何有關涉及全局糾偏的建議。1960年8月，周對李富春提出的糾偏方針，「整頓、鞏固、提高」加以修潤，將「整頓」改為「調整」，增加「充實」一句，使其成為著名的「八字方針」。這一改動使「八字方針」顯得溫潤、委婉，照顧到了毛的情緒。

然而周恩來的現實主義畢竟佔主導，只要劉少奇、鄧小平願意領頭，周馬上響應。1960年3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會上，鄧發言批評報刊上對毛思想的宣傳庸俗化，周當即表示贊成鄧的意見⁴⁵。1961年3月後，中央核心層領導紛紛下鄉調查，基本都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鄲調研一周，5月7日，親自就食堂問題向毛電話匯報，建議解散食堂。但毛卻不在周的電話匯報記錄上明確表態，只是批示轉發下去，供各地同志參考，以後由於劉少奇等強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6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同意，是否參加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

與周恩來的小心翼翼相比，鄧小平因受毛信任而顯得敢說敢為。鄧在核心層中處於重要地位，周恩來一向對鄧小平十分尊重，不僅表現在對鄧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對鄧的黨內地位的肯定和強調方面。1960年3月，周在一次談話中提到「整理毛澤東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這樣黨的領導人來總結」⁴⁶。1960年後，鄧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蘇兩黨談判，但他仍將很大的精力放在國內工作方面，鄧深知國內問題的嚴重性質，全力支持劉少奇，1961年鄧批評八字方針貫徹不力，主張「退夠」。鄧雖表態支持毛搞「三反」，同時又提出開展三反應放農閒進行，被毛接受⁴⁷。

在毛的眼中，陳雲一直是一位「老右傾」。60年代初，柯慶施因知毛澤東對陳雲的冷淡態度，竟也敢在華東散布陳雲是「老右傾」的議論⁴⁸。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陳雲因遭毛批評而告病休息，一年後，陳雲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見，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廬山開會前，陳雲在大連休養，他已有所預感，因而沒有參加會議，他勸正在大連休養的鄧子恢也不要，事後，鄧子恢十分感激陳雲的提醒⁴⁹。1960年的調整方針得到陳雲的全力擁護，同年底，陳雲提議，動用外匯進口糧食，周恩來原準備進口150萬噸，陳雲要求增加進口量，經中央同意改為進口250萬噸。在劉、周、陳、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從澳洲進口的第一批糧食抵達天津港。3月，周又給毛寫信，請求批准進口500萬噸糧食。1961年8-9月，廬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陳雲復向毛建議通過法國轉口購買美國糧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饑饉遍地的非常時期，這些從國外進口的糧食拯救了許多百姓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層中，朱德的政治影響力最為薄弱，朱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到毛的批評。10月，毛將朱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檢討批轉給全國縣團級黨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儀隴與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飯」，「難過得許久說不出話來」⁵⁰。在大饑荒期間，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對國內的災情憂心如焚。儘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層，「對中央內部的事情卻知道甚少，他也不打聽」⁵¹。

朱德身為政治局常委，許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卻了解全部情況。1960年後，北京作為首善之區，也出現了極嚴重的困難局面。彭真作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對大躍進的不滿逐漸明顯，1962年1月，甚至在小範圍內講話，徑直要求毛做檢討，他說，「如果毛主席的錯誤的1%、1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⁵²。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國家已進入非常時期，但他們只能聽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陳毅對華東熟悉，華東幾省的領導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難時期，江浙情況尚非特別嚴重，還可接待外賓參觀南京、蘇州、杭州等少數城市，陳毅陪外賓來華東，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詢問災情，卻無人敢向陳毅反映真實情況⁵³。

幾個中央局第一書記直接面對基層，承受很大壓力，在那幾年，都全力救災。只有華東的柯慶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躍進期間極為活躍，與長江下游的柯慶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後川北大量餓死人，四川還多運糧食支援外地⁵⁴。柯慶施則比李井泉幸運得多，他的直接領地上海，郊縣雖有農業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現「非正常死亡」，所以柯慶施可以繼續歡唱躍進曲。

劉、周、鄧、陳為中央決策的錯誤導致百姓無謂犧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劉犯忤向毛進言，要求放寬政策，劉甚至對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⁵⁵。據鄧力群回憶，1962年春，劉在與他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其時，劉「情不自禁，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⁵⁶！劉少奇等都是務實的領導人，一旦毛澤東稍稍鬆手，他們的務實精神馬上就解放出來。劉、周、鄧、陳的態度完全表達了全黨絕大多數幹部的意願。1960年後，許多高幹目睹人民受難，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前往信陽調查，返京後與妻抱頭痛哭⁵⁷。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1960年後眼見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很深的愧疚，遂支持包產到戶。在這幾年，省、地、縣一級的幹部普遍患上了浮腫病、肝腫大，一些幹部的家屬甚至也在大饑荒中餓斃。一些地委書記、專員「每每為災民號啕大哭」。江蘇省長惠浴宇為救災「心力交瘁」，自陳已成了「災官」、「賑官」⁵⁸。

中共歷史上長期戰鬥在農村，許多高級幹部都有「民本」情結，1960-61年對他們的刺激極深，「一想起來就膽戰心驚，夜不能寐」，因為「災區人民的淒慘，付出的犧牲，竟比戰爭年代還要多」，而他們都清楚，「這完全是無謂的犧牲啊」⁵⁹，以致陳雲慨歎，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⁶⁰。

60年代初，劉、周、鄧、陳的一系列舉措證明，他們與那些高蹈的「理想主義者」和「革命巨子」（魯迅語）並非一類，他們對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懷不忍之心，由此，劉少奇等才能從過去對毛的無條件服從中解脫出來，回歸到常識理性。劉少奇在這一階段總攬全局，地位舉足輕重，這是他在建國後對國家、民族、百姓貢獻最大、出力最多的時期。然而正因為如此，毛對劉的不滿也在急劇增長。

三 重新回到階級鬥爭

毛澤東認定「12條」、「60條」等糾偏文件下發後，農村情況肯定好轉，從這點講，毛的判斷不錯，但是饑荒太大，恢復較緩慢，與此同時，許多基層幹部的極左已積重難返，對中央糾偏政策大打折扣，使中央精神難以全面落實。毛對這些明顯估計不足。

從毛澤東的角度講，他已作出相當的讓步，凡所能退讓的他都讓了。1960年後，毛在若干文件上刪去「毛澤東思想」，他也解散了過去一向堅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准從國外進口糧食，在一段時間裏，他也沒明確表示反對包產到戶。

毛知道自己闖了大禍，在1961年沒太具體過問劉等的糾偏，毛也是在這個時期停止了吃肉。但是從內心深處，毛不認為自己有何大錯。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沒有甚麼了不起。「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在這一點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數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來南京，江蘇省委領導向其匯報已出現群眾餓死的嚴重情況，林彪開導他們，「我們這麼大的國家，死幾個人算甚麼」⁶¹。可是餓死人畢竟不是好事，正是因為餓死人現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猶如避鬼神。在他看來，所有有關「黑暗」面的報導都像一把利劍指向自己，毛用堅強的意志為全黨定下調子，不許亂講，凡亂言餓死人事，一律以攻擊三面紅旗論處。1961年3月23日，毛親筆修改文件：「中央認為最近幾年建設成就是偉大的，證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只是在「具體工作」方面發生一些缺點和錯誤，造成了一些損失⁶²。所以當陳毅南下時，其老部下不敢向他直言。徐子榮雖親眼目睹信陽慘狀，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場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澤東認為，在嚴重的困難面前，黨內普遍已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了「動搖」。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當面叱責劉少奇，「頂不住了，看我死後你怎麼辦！」⁶³而毛相信，唯有他自己才能力挽狂瀾。毛的方法，概言之，就是「硬著頭皮頂住」，具體內容有五：

1、堅持對形勢的樂觀估計。毛告訴全黨：「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形勢正在好轉，問題正在解決⁶⁴。1961年12月29日，毛批轉錢昌照等歌頌農村五穀豐登的詩，以說明農村出現的一片繁榮景象⁶⁵。1961年，毛將「紙老虎」的論斷再次搬出來，以鼓舞全黨、全民戰勝困難的意志。

2、毛知道劉等在內心中已對自己有怨言，他抓住調查研究一事，向劉等反擊。1961年3月13日，毛給劉、周、鄧、陳、彭真寫信，他先爭取主動，表示「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隨即批評劉等對公社內部的關係「至今還是不甚了了」。毛咄咄逼人道：「不是嗎？我說錯了嗎？」⁶⁶

3、毛看到劉的影響力正在不斷擴大，「一國二公」幾成定局。毛加緊批轉各類文件，以維持自己在黨機關的領導權威和影響力。1961年，毛給李井泉寫信，要求各省市第一書記「發善心」給他寫信，他許諾自己一定給他們回信⁶⁷。

4、關心林彪健康⁶⁸，扶持林彪抗衡劉少奇等。

5、強調階級鬥爭。毛從另一個角度來談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對階級鬥爭抓得不緊——「見事遲，抓的慢」⁶⁹。

然而全黨上下埋怨，批評的壓力太大，毛澤東在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講了幾句帶自我批評的話，他甚至在講話中稱讚陳雲搞經濟內行（正式稿中刪去）。七千人大會後，毛離京南下，對劉少奇等的不滿已越積越深。毛澤東敏銳地發現，由劉少奇主持的糾偏已愈走愈遠，不僅涉及經濟、文教、外交、統戰，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領域，在這種大氣候下，對毛不滿的潛流已在全黨上下廣泛蔓延。

毛澤東同意調整，但不容涉及三面紅旗。毛長期以來就一直對劉少奇有怨氣，姚依林稱，1956年中共八大通過的新黨章刪去「毛澤東思想」

一詞給毛造成「極大不愉快」，劉等從而「得罪了老人家」⁷⁰。站在毛的立場，劉舊錯未改，又添新錯，且都是錯在重大原則問題上。1961年7月17日，劉在瀋陽說，「三面紅旗可以讓人家懷疑幾年」⁷¹。7月19日，劉在哈爾濱又說，「有人懷疑三面紅旗是可以理解的」⁷²。在當時的形勢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讓，但對劉的不滿已形之於色。1961年5月，毛就降低指標事講話，他說，降就降，「無非是外國人罵我們不行」⁷³。

劉少奇等主持罷免浮誇幹部一事，也給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1960年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義表示，「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⁷⁴。劉少奇當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為了整肅綱紀，還是罷免了幾個毛的愛將的職務：吳芝圃先降為河南省長，繼而轉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的閒職；舒同也調任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實際在家賦閒。劉極注意分寸，1962年前對曾希聖毫無動作，李井泉、王任重也照做他們的封疆大吏，但還是引起了毛的不快。毛儘管同意懲處某些地、縣級幹部（柯慶施下令逮捕死人較多的江蘇寶應縣書記）⁷⁵，但不願對他們太動真格。1961年1月中央擬定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條文，原有「保護人民安全，打人要法辦，打人要償命」、「保護人民自由，隨便罰人、抓人、關人、搜查要法辦」等內容，被毛批評為「太複雜……有幾條執行起來可能起反作用」，結果被改成「同勞動同食堂」，「辦事公道」等一團和氣的文字⁷⁶。

毛最不能容忍的是劉少奇講話中流露出的那股「算帳」的意味。在毛聽來，劉的許多話猶如赫魯曉夫的「黑報告」。1962年3月，劉召見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談話，要求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⁷⁷。劉的這番話已涉及毛統治最敏感的部分，事後，劉覺得不妥，堅決不同意公安部黨組印發他的這番講話，他說「將來會出毛病的」⁷⁸。1962年冬春，劉少奇加大了對大躍進以來錯誤的批評，劉的態度有廣泛的黨內基礎，七千人大會精神傳達後，許多基層黨組織成員對七千人大會不承認犯了路線錯誤極為不滿，江蘇省參加省委擴大會議的一些代表甚至呼籲中央為彭德懷平反⁷⁹。江蘇省委常委書記劉順元也不同意所謂錯誤在於「天災」和「民主革命不徹底」⁸⁰，劉順元放言：根本問題是出在「君臣相見」⁸¹。所有這些在毛眼裏都被認為是「尖銳的指向」他個人的。

劉少奇在1962年上半年不斷談形勢的嚴重性，也使毛愈來愈相信，劉是心懷叵測。劉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第一次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5月24日，劉試探性地提出「現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號」⁸²，劉雖然迫於毛的壓力，未能公開提出反「左」，但劉的語言愈來愈尖銳。1961年8月28日，劉在廬山會議上插話，提到「整個國家要破產、垮台，國民經濟要崩潰」⁸³。劉更談到，「如果搞不好，我們要跌下台」一類的話⁸⁴。從七千人大會到1962年上半年，劉幾乎逢會必講困難形勢，在2月的西樓會議上，竟出言不慎，自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⁸⁵。直到5月，還認為「國民經濟要崩潰」⁸⁶。儘管劉所述的困難皆是事實：1962年初，國內情況仍極嚴峻，僅河南省六個專區統計，外流人口就達32萬人。貴州省的斷炊戶達一萬多戶，全國23省孤兒達幾十萬人⁸⁷。四川省直到1962年3月底，還有一千多高爐，佔用九萬多職工⁸⁸。但以毛的敏感觀之，則會得出另一種判斷：「非常大總統」已不安於份，無非是以講困難為由，逼毛徹底交權！

毛澤東可以接受劉少奇「形而下」的糾偏，他本人在1960年下半年後也親自做了一些調整政策的工作，但絕不容許糾偏涉及「形而上」，因為「形而上」已與毛水乳交融。1962年上半年，劉主持的糾偏已逼近「形而上」。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口頭報告提到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陳雲在七千人大會陝西代表團會上有關黨內缺乏民主的講話——陳雲說，這幾年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口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⁸⁹。周恩來、陳毅3月在廣州會議上對知識份子「脫帽加冕」，種種跡象表明，劉等已開始全面修正毛自1958年以來的路線。

毛澤東已看到經濟形勢全面趨向好轉，他心中有數，最危急的時期已經過去。蔣介石在1962年夏叫嚷反攻大陸，但毛完全掌握蔣的底線，毛、周急電參加中美大使級會談的中方代表王炳南飛京，再返華沙向美國大使摸底，知肯尼迪政府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所以當陳雲以對付蔣反攻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戶，毛根本不能接受⁹⁰。

因此，1962年上半年，毛的態度逐漸明朗化。1、毛不同意周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即使周多次請毛表態，他就是不答覆。毛得到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支持⁹¹。2、毛不同意實行包產到戶，雖然劉、周、鄧、陳都傾向於支持鄧子恢的意見，但陶鑄、胡耀邦等黨內許多高幹都對包產到戶持反對意見，甚至連彭德懷也反對。3、在毛的影響下，黨內刊物大量刊載歌頌斯大林的文字。1962年上半年，毛基本住在南方，密切注視著劉等的一舉一動，他守住底線，準備反擊。

1961-62年，劉少奇因力主實事求是，正視困難，其個人威望得到大幅提高，儘管劉具事實正確，卻因毛獨享「解釋權」，而不具意識形態的「正確性」。劉在1962年春之後，同意「三自一包」，但只是私下流露而未有自己的解釋，劉只能默認地方悄悄幹，不是「光明正大」。毛卻師出有名，名正言順，因為從1961年以來，黨內的主流意見一直是批判「三自一包」和講「民主革命不徹底」，劉自己長期也是持這種觀點。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其議題之一即是批評「三自一包」，會後中央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單幹」。2月，新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在省常委會議講話，轉達劉少奇對安徽責任田的意見，劉認為責任田「要走回頭路，這是很明確的」⁹²。3月，北京已在內部批評湖南五縣「廳分田黑風」⁹³。劉少奇已將自己置放於一個尷尬的境地。

1962年8月1日，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再版，他試圖在毛思想的大框架下，搞出自己的新解釋，但是馬上遭到毛的還擊。8月6日，毛開始談「階級、矛盾、形勢」，一旦毛反擊，劉除了接受毛，別無其他選擇。在北戴河會議期間，劉少奇言語不多（姚依林稱「劉一言不發」，「周恩來則被攻擊嚴重」）⁹⁴，毛既已開口，劉、周、鄧、陳還能說甚麼呢？除非順著毛的話說，劉平靜地接受毛大搞階級鬥爭的決

策，僅向毛進言，搞階級鬥爭勿影響經濟調整，得到毛的同意。

八屆十中全會後，毛澤東再次躍入前台，只有最具政治敏感的人才知道應急流勇退。1962年8月，陳雲告病休息，1963年胡喬木稱病，開始長期休養。同年，曾被毛欽定的「老右傾」、江蘇省委常委務書記劉順元經其老友——中央委員鄭位三的点撥也主動隱退，鄭位三並意識到黨內從此將無寧日⁹⁵。

1962年10月後，各省都已調整好姿態，紛紛按照毛澤東的新調門向北京提供各地階級鬥爭尖銳、資本主義嚴重復辟的材料，四川、山東甚至已將困難時期出現的「反動兒歌」的資料搜集完畢⁹⁶，下一步就是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階級鬥爭蓋子」的經驗問世；4月，河北邢台經驗上報——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平地掀起，是為「四清運動」，其主調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民主革命不徹底」，其方法就是「紮根串聯」，只是距毛首先提出這些口號已推遲了兩年。

註釋

- 1 1959年部分省區就有餓死人的報告。1959年初，南京遠郊的句容縣寶華公社兩個大隊已有餓死人現象，高淳縣在1959年餓死1,529人。見丁群：《劉順元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312；另有資料反映：該縣在1958年冬至次年春，「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六千人。參見錢鋼、耿慶國主編：《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582。江蘇寶應縣從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絕大部分為缺糧而死。1960年春，中央糧食部門和江蘇省委曾分別派工作組前往該縣調查。見《70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448。
- 2 參見錢鋼、耿慶國主編：《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頁580。
- 3 4、7、8、9、10、11、12、13、14、15、16、17、19、20、21、22、25、26、28、29、30、31、35、47、62、64、65、66、67、68、69、74、76、9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71；98；40；64—65註釋1；100—101註釋2、3；59註釋1；58；44、45註釋2；68；69；71；161；207—208註釋1；207；349—50、352—53；349；215；364—65；364、366註釋2、368—69註釋1；334—35註釋1；356及註釋4；374；384；14、262、264；555註釋1；129註釋1；458；517；619註釋1；440—41；484；487；465；364；418—19；436註釋4。
- 5 24、27、32、33、34、87、93、96 引自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所藏當代中國史料。
- 6 李樹傑：〈談「中寧事件」〉，《寧夏文史資料》，第21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頁110。
- 18 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8年8月號，頁45—46。
- 23 61、75、79、80、81、95 《劉順元傳》，頁329；315；321；343；335；344；352。
-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458。另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5；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103、105。
- 37 39、40、41、71、72、77、78、82、83、84、86 同上註，《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488；525；489；509；530；531；551；552；524；538；530；555。
- 38 60、73、89 孫業禮、熊亮華：《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32；224；219；233。
- 42 43、44、45、8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69；299；377；296；468。
- 4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537。
- 48 顧復生：〈紅旗十月滿天飛〉，孫頌序，載《江蘇文史資料》，第100輯（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7），頁5。
- 49 《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535。
- 50、51 朱敏：《我的父親朱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頁304、401—402。
- 5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1026。
- 53 58、59 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記錄整理：《朋友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215—16；213；212—13。
- 54 姚錦：《姚依林百夕談》（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頁160。另見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313。
- 55 〈劉源、何家棟談劉少奇與四清運動〉，《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
- 56 見註36鄧力群，頁121。
- 57 陶駟駒主編：《徐子榮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97），頁253。
- 63 〈劉源、何家棟談劉少奇與四清運動〉，《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頁133。
- 70、90、94 姚錦：《姚依林百夕談》，頁153；165—67；167。
- 85 姚錦：《姚依林百夕談》，頁165；另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549。
- 92 劉以順：〈毛澤東在安徽推廣責任田的前前後後〉，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54輯（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5），頁117。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